

# 腐败、产权与政府补助

陈兴

**【摘要】** 本文深入考察了腐败、所有权性质对于公司所获得政府补助水平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腐败活动使公司获得更高水平的政府补助，整体上看，国有企业比民营企业获得更多的政府补助。本文进一步考察了创新补贴与盈余管理两种动机下，腐败与政府补助水平的关系。在创新补贴动机下，腐败与政府补助的关系较为复杂，采用分位数回归的结果表明，腐败对于政府补助水平较高的企业无显著影响，但会显著促进其它企业获得政府补助，而产权性质对于政府补助获得的帮助不大。在盈余管理动机下，腐败对于获得政府补助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但国有企业会获得更多的政府补助。本文对于政府补助领域的反腐败制度建设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 腐败 政府补助 企业产权

## Corruption, Ownership and Government Subsidy

Chen Xing

**Abstract:** We explore effects of corruption and ownership on amounts of the government subsidy. It shows that the corruption can help firms acquire more subsidies.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OEs) get more subsidies than Non-SOEs as a whole. Furthermore, we investigate the R&D motivation and the earnings management motivation which may affe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rruption and government subsidies. The corruption has a complicated effect on government subsidies for the R&D motivation. Based on the quantile regression (QR), the corruption has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firms with a high level of government subsidies. While other firms can get more subsidies from bribes. Ownership seems to have no help for acquiring subsidies. For the earnings management motivation, the corruption has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firms' subsidies. While SOEs can get more government subsidies under this situation. We should enhance the construction of institutions and fight the corruption to foster a well-being environment for firms.

**Keywords:** Corruption Government Subsidies Ownership

## 一、引言

政府补助是政府财政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府根据一定时期有关政治、经济的方针和政策，直接或间接向微观经济活动主体提供的一种转移支付(王凤翔等，2005)。政府补助作为政府介入微观主体经济活动的重要方式，可以弥补市场失灵所带来的外部性损失。如针对科研创新活动的政府补助，可以弥补知识的外溢效应给创新活动主体所增加的成本，使社

会的创新活动保持在最优水平(Romano, 1989; Usher, 1964; Arrow, 1962)。但是,在我国现有的市场经济仍不完善,制度体系仍未健全的现实条件下,政府补助的作用发挥在实践中是大打折扣的,政府在补助对象的认定、审批和补助发放的过程中,带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法律和制度的约束较弱,形成了企业向政府“寻租”以获取补贴的空间。如部分学者研究指出,民营企业可能通过建立政治联系获得更多的政府补贴,但并未带来企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提高(余明桂等, 2010)。

在我国资本市场上,政府补助对于上市公司而言有着特殊的作用,常被用作粉饰业绩“扭亏为盈”的重要手段(王红建等, 2014; 孔东民等, 2013; 潘越等, 2009)。如 2013 年频频被证监会处罚的\*ST 亚星,当年的三季报显示,公司前三季度累计亏损约 9617 万元,而公司 2013 年 12 月 31 日发表公告称:公司当天收到了两笔补贴,分别为 1749 万元和 1.37 亿元。前笔补贴是专项用于 2013 年度企业经营困难补贴;后一笔补贴分为两项用途,5655 万元用于弥补公司退城进园搬迁损失,8045 万元用于 2013 年企业经营困难补贴,堪称“及时雨”<sup>①</sup>。据统计,2014 年上半年,2537 家上市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266 万亿元,同比增长 10.13%,而同期政府投入的补贴总额比 2013 年上半年增加 82.5 亿元,同比增长 13.63%<sup>②</sup>,政府补助对于业绩的贡献作用不言而喻。因此,在我国的制度背景下,研究上市公司寻租行为与政府补助的获得之间的关系,特别地,分别在创新补贴动机和盈余管理动机下,探究企业腐败与政府补助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文可能在以下几个方面丰富了已有文献:第一,本文使用微观层面的企业腐败数据,对企业寻租行为进行了更深入的刻画,补充了现有文献从政治联系角度,对寻租行为和企业政府补助获得的探讨。部分学者从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建立政治联系的角度,来探讨寻租行为对公司获得政府补助的帮助(Faccio, 2006; Chen et al., 2005; 余明桂等, 2010; 郭剑花等, 2011)。而本文认为,政治联系的建立和维持需要支付寻租成本,已有文献对寻租成本的反映存在不足。本文在此基础上,对公司寻租行为进行了更深入的刻画,借鉴 Cai et al.(2011)提出的企业“招待差旅费用”支出(ETC),作为衡量企业腐败的指标,探究腐败与企业的政府补助获得之间的关系,并考虑了公司不同的产权性质对这一关系的影响。第二,本文丰富了公司层面对于腐败行为的研究文献,Cai et al.(2011)提出企业的“招待差旅费用”这一指标,用来探讨企业的腐败行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表明,腐败程度较高的企业有着较低的生产率水平。之后学者们使用这一指标分别从企业的销售行为、创新活动和企业生命力等不同维度探讨了腐败的影响(黄玖立等, 2013; 刘锦等, 2014; 魏下海等, 2015)。本文从政府补助的角度,补充了探讨公司层面腐败影响的相关文献;第三,本文区分了政府补助发放的不同动机下,腐败行为对公司政府补助获得的影响。借鉴孔东民等(2013)的研究,对政府补助的创新补贴动机和盈余管理动机进行了识别,并分别检验这两种动机下,腐败对于企业获得政府补助的影响,明晰了不同动机下产权性质对于企业获得政府补助的作用,使得对于腐败、产权和政府补助关系的探讨更加细化,弥补了现有文献在研究中,很少区分和

<sup>①</sup> 资料来源:《一年内两被立案被称“少见” \*ST 亚星靠政府补贴脱困存蹊跷》,《证券日报》,2014 年 1 月 27 日。

<sup>②</sup> 资料来源:《政府补贴上市公司催生虚假牛市》,《证券日报》,2014 年 9 月 23 日。

控制政府补贴动机的不足。

##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本文试图研究腐败对于企业获得政府补助的作用，借鉴以往文献对于腐败问题的讨论(魏下海等，2015；魏尚进，2001；Murphy et al., 1993)，本文所指腐败，如无特别说明，主要是指官员在经济领域内的腐败行为（如官员以权谋私、受贿、从企业抽取好处等），不涉及政治腐败（如贿选、打击政敌、官场内部交易等）和私人部门内部的贿赂与腐败。

本文所指的腐败是企业向政府的经济寻租活动，政府通过政治权力，控制政府补助的发放对象和发放金额，创设了企业的向政府“寻租”的空间。而企业贿赂的金额，作为企业的寻租成本，即是政府所获得的租金。所以，腐败程度越高的企业，表现出了更高的寻租努力，从而也会带来更多的收益，即更高的政府补助水平。以往研究指出，企业通过建立政治联系等寻租行为有利于企业政府补助的获得。本文采用的腐败的度量指标是对于企业寻租行为成本的刻画，因此，与以往文献的研究结论一致，我们预计，腐败程度越高的企业，将会获得更多的政府补助(余明桂等，2010；许罡等，2012；Chen et al., 2005)。

从产权性质上来看，国有企业的所有者为政府，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多带有行政级别，因此，其和政府所具有的天然的政治联系，降低了其寻租成本。另外，虽然本文不讨论政治领域的腐败问题，但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和政府官员之间，不仅可能存在着寻租所造成的经济利益的交换，还可能存在互惠的政治利益交换(Shleifer and Vishny, 1994)，而这一点，是民营企业与政府关系中不具备的。最后，国有企业常在所在地区内有着重要的经济地位，地方官员出于政绩考虑，为了维持地方经济的稳定和繁荣，有动力对陷入困境的国有企业施以援助。因此，我们提出假设 1：

**H1：腐败有助于公司获得政府补助，国有企业比民营企业获得的政府补助更多。**

民营企业不像国有企业那样，具有天然的政治联系，因此，民营企业与政府良好关系的建立和保持，就需要支付更多的寻租成本。国有企业贿赂政府官员时，既可以通过输送经济利益，又可以通过政治利益的输送，而民营企业只能依靠经济利益的输送。因此，相比于国有企业而言，民营企业更依赖于腐败（经济利益的贿赂）去获取政府补助。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提出假设 2：

**H2：民营企业更依赖于腐败去获得政府补助。**

现有文献关于我国政府补贴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种动机，即创新补贴动机和盈余管理动机。政府补助的创新补贴动机是指政府补贴具有较高创新能力的产业和企业，以提升整个社会的科技发展水平，进而促进经济的发展。创新补贴动机下的政府补助研究，是将政府补助看做是政府对企业 R&D 活动的补贴，并以此探索其对企业自身 R&D 投入等企业经营因素的影响(陆国庆等，2014；顾元媛，2011；解维敏等，2009)。政府补助的盈余管理动机是指政府补贴具有盈余管理需求的上市公司，以避免其退市和特殊处理，或者是为使其在资本市场上的融资达到监管部门所规定的条件。盈余管理下动机下的政府补助研究，是将政府补助作为企业缓解融资约束的融资来源来加以考虑(王红建等，2014；潘越等，2009；李汇东等，2013)。本文试图分别检验在政府补助的这两种不同动机下，腐败对上市企业获得政府补助的作用。

由于知识的外溢效应,企业创新活动的私人成本要大于社会成本,即科技创新带有较强的正外部性,因此,政府为了使社会上的创新活动达到最优水平,避免外部性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应该给予创新企业以补贴,使其私人成本等于社会成本。因此,政府补贴应具有创新补贴动机,这一动机也被很多学者所研究(Tassey, 2004; 陆国庆等, 2014; 解维敏等, 2009)。

而在政府补贴动机下,腐败对政府补助的获得所能够发挥的作用,是不确定的。一方面,基于创新补贴的动机的政府补助发放,也会面临着政府从众多符合条件的公司和项目中筛选的过程,形成了可供企业向政府寻租的空间(顾元媛, 2011),而基于贿赂的寻租行为无疑对于企业获得政府补助有着重要的帮助。即研发投入和腐败有着互补作用,研发投入高的企业,腐败对企业获得政府补助也有所帮助。另一方面,企业的资源是有限的,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寻租行为势必会占用企业对创新活动的资源投入,进而可能降低企业的创新水平和以此获得的政府补助。即研发投入和腐败有着替代作用,研发投入高的企业,腐败对于企业获得政府补助的帮助作用并不显著。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提出两点对立假设:

**H3a:** 政府补助具有创新补贴动机,腐败会促进在创新补贴动机下的政府补助获得。

**H3b:** 政府补助具有创新补贴动机,腐败对创新补贴动机下的政府补助获得无帮助。

政府补助的盈余管理动机已被大部分关于我国资本市场的实证研究文章所证实(王红建等, 2014; 孔东民等, 2013; 步丹璐等, 2012; Chen et al., 2008)。地方政府出于政绩考虑,为了维持地方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对于面临着退市风险的上市公司,常以政府补助的形式施以援手,供其渡过难关。对于具有融资需求的公司,政府补助也被作为使其满足监管部门规定的外部融资条件的工具。由于公司上市资格的稀缺,地方政府“保壳”的动机也就更加强烈。因此,政府补助具有盈余管理动机(孔东民等, 2013)。

在政府补助的盈余管理动机下,我们认为,腐败对于企业获得政府补助没有显著的帮助作用。因为,对于存在盈余管理需求而需要政府施以援手的企业,常面临着亏损和经营不善的窘境,此时企业可能已经没有足够的资源用于寻租行为。政府补助正是为了缓解企业所面临的融资约束而发放的,政府官员预期补助会使得企业扭亏为盈,提升经营业绩,使企业摆脱经营困境,而其可以从摆脱困境后的企业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官员对现时利益的预期较低,而存在对未来利益的预期,政府官员在企业亏损时的寻租动机因而会有所减弱。因此,在政府补助的盈余管理动机下,腐败对于政府补助的获得应无显著的影响。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提出假设 4:

**H4:** 政府补助具有盈余管理动机,腐败对盈余管理动机下的政府补助获得无显著影响。

### 三、数据来源与研究设计

#### (一) 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 2015 年 6 月 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 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追溯其在 2007-2013 年度的相关变量,综合了国泰安(CSMAR)数据库和 Wind 资讯金融终端来提取相关的变量指标。对于以上数据库中未包含的变量,通过上市公司对应年份的年报手动提取获得,公司年报来自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政府补助数据来自于 Wind 资讯金融终端。因为财政部于 2006 年 2 月 15 日发布了新的



《企业会计准则》，并自 2007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其中《企业会计准则 16 号——政府补助》的对政府补助会计规范方面做了细致的规定，对公司的政府补助信息披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提高了企业会计信息质量，填补了旧规定的空白<sup>①</sup>。因此，考虑到统计口径的一致性和数据的可获得性（数据搜集期间上市公司 2014 年年报还未完全披露），本文所选择的样本时间区间为 2007 年-2013 年。

招待差旅费用（ETC）数据通过上市公司年报手工整理，具体是通过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附注中披露的“管理费用”科目明细来获得，在既披露了业务招待费用也披露了差旅费用的上市公司中，通过加总两项指标来获得公司的招待差旅费用这一数据。公司的研发支出数据主要从以下渠道获得：首先，如果年报中披露了公司该年度的研发支出，以该数据作为公司的研发支出。若在公司年报中未直接披露公司该年度的研发支出，则在公司年报中“开发支出”项目下获得公司的资本化研发支出，在“管理费用”项目明细中获得公司的费用化研发支出，两者之和即为公司该年度的研发支出。

盈余管理需求的确定参照了孔东民等(2013)的方法，具体来说，对于有增发、配股等外部融资需求的公司，根据其增发、配股和可转债的发行时间，考察其之前三个会计年度的业绩表现，将扣除了政府补贴之后的净资产收益率  $ROE_{new}$  与证监会对于发行的财务要求作比较，若低于监管要求，则将其划分为有盈余管理需求组，在设定门槛值时，将法定门槛值提高 2%，以容纳一定的噪音。对于未被特殊处理（非 ST）的公司，若公司在上一会计年度亏损，而本年度扣除政府补贴后亏损或微盈（ $ROE_{new} < 2\%$ ），则认为公司该年度有盈余管理需求。对于已被 ST 的公司，若在本年度扣除政府补贴后亏损或微盈（ $ROE_{new} < 2\%$ ），则将其划分为有盈余管理需求组。

## （二）变量定义及说明

本文为消除异常值对于实证结果的影响，所有连续变量均在 1% 的分位数水平上做了 Winsor 处理，在实证研究中所采用的主要变量如下：

政府补助（sub）：考虑到对于规模不同的企业，相同金额的政府补助的效果也不尽相同，为了消除公司规模对于政府补助的影响，在实证分析中，用公司总资产对政府补助数据进行了标准化处理。采用政府补助与公司总资产之比作为本文实证分析的被解释变量(孔东民等，2013；潘越等，2009)。

招待差旅费支出（bribe）：管理费用科目明细下“业务招待费”和“差旅费”之和与公司总资产之比。这一指标最早由 Cai et al.(2011)提出，本文将其作为企业腐败的代理变量。

公司研发支出（RandD）：公司该年度研发支出与营业收入之比。公司该年度的研发支出来自于公司年报中披露的研发的资本化支出（开发支出）和费用化支出（管理费用科目下“研发费用”）之和。

盈余管理需求（EM）：该变量是二值变量，若公司在该年度有盈余管理需求，则变量设为 1，否则为 0。对于盈余管理需求的判定，本文参照孔东民等(2013)的方法。

产权性质（soe）：该变量是二值变量，若公司是国有控股公司，则变量设为 1，否则为 0。在产权性质判定中，追溯到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公司规模（asset）：公司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公司盈利能力（roe）：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ROE）。

---

<sup>①</sup> 资料来源：“《企业会计准则——政府补助》简析》，《财会信报》，2007 年 11 月 19 日。

公司资本结构 (debt): 公司的负债率。

年份固定效应 (year): 样本的时间区间为 2007 年-2013 年, 通过设置年份虚拟变量的方法, 共设置了 6 个年份虚拟变量。

地域固定效应 (acode): 按照地理分区设置地域虚拟变量。具体来说, 将我国划分为华北、东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南和西北七大地理区, 共设置 6 个地域虚拟变量。

行业固定效应 (industry): 综合了申银万国行业分类标准 2011 年版和 2014 年版, 将上市公司划分为农林牧渔、采掘、化工、钢铁、有色金属、建筑建材、机械设备、电子、交运设备、信息设备、家用电器、食品饮料、纺织服装、轻工制造、医药生物、公用事业、交通运输、房地产、金融服务、商业贸易、休闲服务、信息服务和综合共 23 个一级行业大类, 共设置 22 个行业虚拟变量。

## 四、模型构建与实证结果分析

### (一) 模型构建

本文分别采用如下回归模型对理论假设进行检验:

$$(1) \quad \text{sub} = f(\text{bribe}, \text{soe}, \text{soe} * \text{bribe}, \text{asset}, \text{debt}, \text{roe}, \text{year}, \text{acode}, \text{industry})$$

(2)

$$\text{sub} = f(\text{RandD}, \text{bribe}, \text{bribe} * \text{RandD}, \text{soe}, \text{soe} * \text{RandD}, \text{asset}, \text{debt}, \text{roe}, \text{year}, \text{acode}, \text{industry})$$

$$(3) \quad \text{sub} = f(\text{EM}, \text{bribe}, \text{bribe} * \text{EM}, \text{soe}, \text{soe} * \text{EM}, \text{asset}, \text{debt}, \text{roe}, \text{year}, \text{acode}, \text{industry})$$

模型 1 从整体上探究腐败、产权与企业所获得的政府补助水平之间的关系, 用以检验假设 1 和假设 2。模型 2 将政府补助的创新补贴动机引入, 在此情况下考虑腐败、产权与政府补助之间的关系, 用以检验假设 3a 和假设 3b。模型 3 引入政府补助的盈余管理动机, 用以检验假设 4, 来研究此情形下腐败对企业获得政府补助的影响。

### (二) 描述性统计分析

在研究样本的数据搜集过程中, 共有 12547 个公司-年份样本点具有政府补助金额的数据, 但主要受限于上市公司招待差旅费用的披露情况, 在模型 1 和 3 的分析中, 包含 5858 个公司-年份样本点, 而在模型 2 的分析中, 包含 5791 个公司-年份样本点。

我们用所搜集到的 12547 个公司-年份的政府补助数据, 来对上市公司的政府补助情况作以整体描述。首先, 依年度分度的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司数量和每家有政府补助公司所获得的平均政府补助金额如图 1 所示。图 1 政府补助的年度分布表明, 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司数量逐渐增多, 除了 2008 年因政府的救市政策对政府补助发放的影响, 上市公司所获得的政府补助金额也在不断增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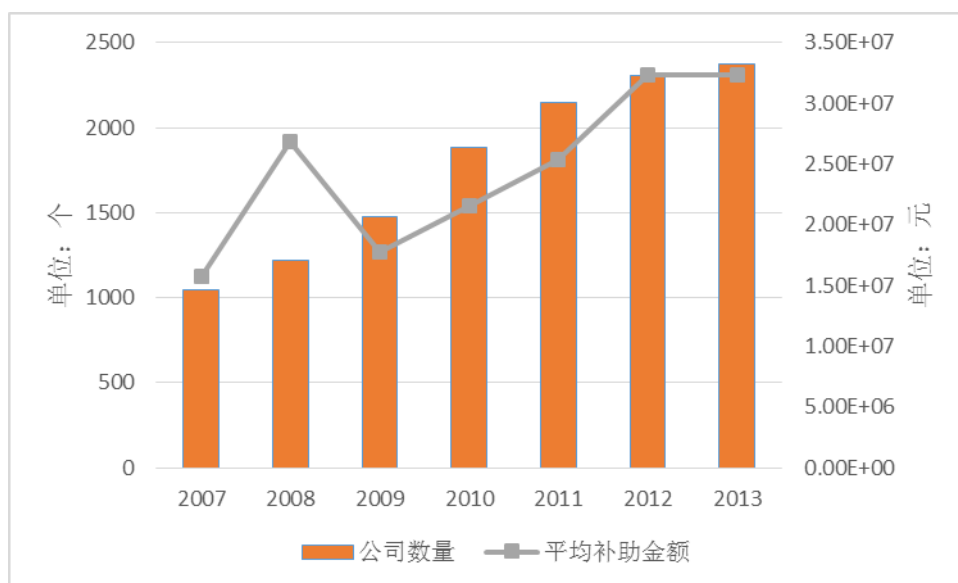


图1 上市公司政府补助的年度分布

其次，依地域分度的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司数量和每家有政府补助公司所获得的平均政府补助金额如图2所示。图2政府补助的地域分布表明，虽然各地上市公司的数量存在很大差异，但平均每家公司所获得政府补助的金额在各地区相差不大，唯一例外的是包含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和内蒙古自治区的华北地区，我们推测，华北地区的平均政府补助金额较高可能和北京作为我国的政治中心，国有企业总部集中于此这一情况有关，本文后续的实证结果也支持国有企业在整体上获得政府补助要多于民营企业这一假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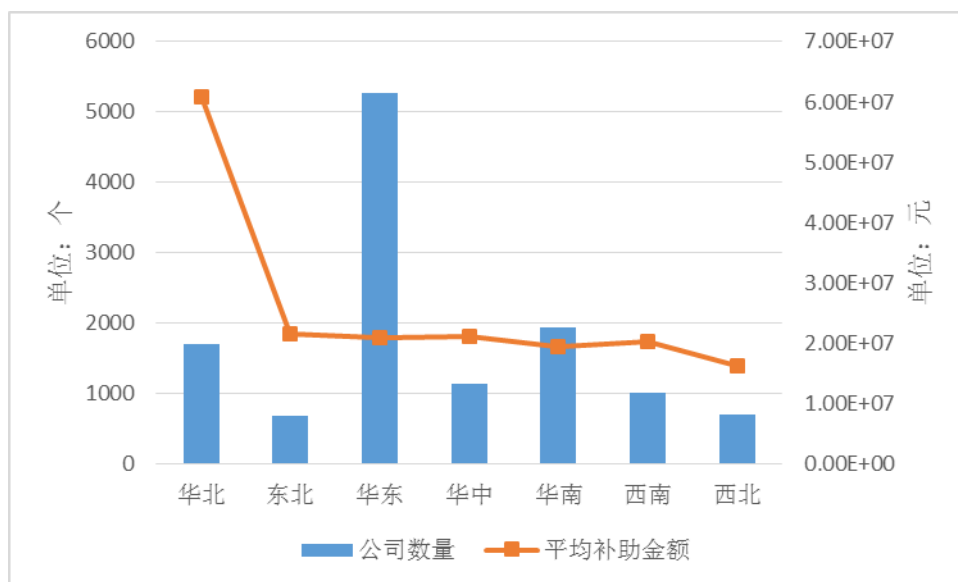


图2 上市公司政府补助的地域分布

最后，依行业分布的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司数量和每家有政府补助公司所获得的平均政府补助金额如图3所示。图3政府补助的行业分布表明，各行业上市公司数量存在差异的同时，不同行业所获得的政府补助金额也存在较大差距。平均来说，垄断性行业、重工业获得的政府补助较多，而市场竞争程度较高的行业和轻工业的政府补助较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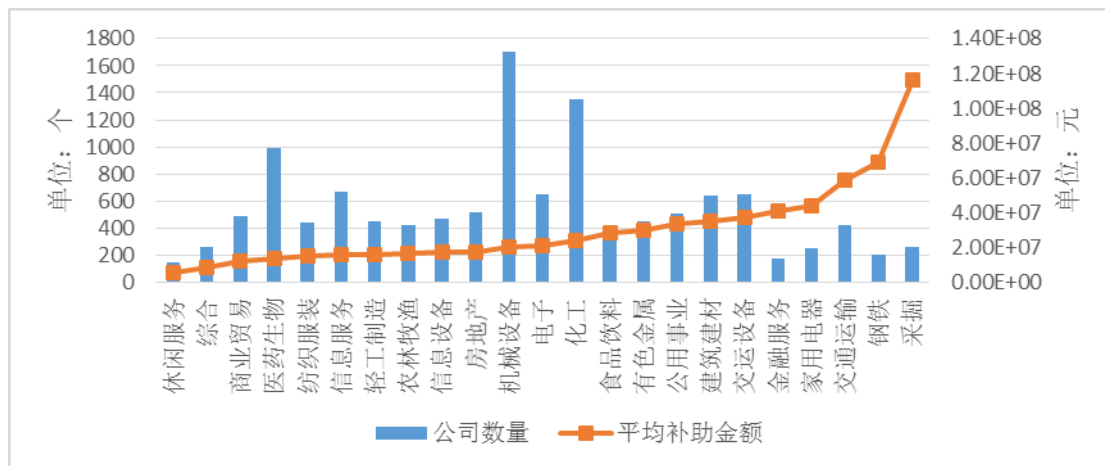


图 3 政府补助的行业分布

本文实证分析中所用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1 所示。



表 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N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sub	5858	0.50	0.66	0	4.17
bribe	5858	0.30	0.28	0.03	2.13
soe	5858	0.45	0.50	0	1
EM	5858	0.22	0.42	0	1
RandD	5791	2.03	3.04	0	16.65
asset	5858	21.65	1.18	18.76	26.76
debt	5858	43.71	22.83	4.12	156.72
roe	5858	5.73	14.56	-74.83	41

由表 1 可知，政府补助和公司的招待差旅费用占公司总资产的比例较小，集中在 0-5% 这一范围内。在实证分析的样本中，国有企业占比约为 45%，略少于民营企业。有盈余管理需求的企业占比约为 22%，大约占整个回归样本的五分之一。

### （三）腐败、产权性质与政府补助

首先，我们用模型 1 来检验假设 1 和假设 2，所得的回归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腐败、产权与政府补助的关系

	(1)	(2)	(3)	(4)国有	(5)民营
bribe	0.1831***	0.1394***	0.1390**	0.1490	0.1302**
	(0.0497)	(0.0509)	(0.0579)	(0.0977)	(0.0594)
soe	0.0247	0.0417**	0.0413		
	(0.0194)	(0.0205)	(0.0369)		
soe*bribe			0.0011		
			(0.1048)		
asset	-0.1000***	-0.0972***	-0.0972***	-0.0945***	-0.1088***
	(0.0102)	(0.0115)	(0.0116)	(0.0146)	(0.0185)
debt	-0.0011**	0.0003	0.0003	-0.0013	0.0014*
	(0.0005)	(0.0006)	(0.0006)	(0.0009)	(0.0008)
roe	-0.0037***	-0.0028***	-0.0028***	-0.0058***	0.0008
	(0.0009)	(0.0009)	(0.0009)	(0.0013)	(0.0013)
年份固定效应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域固定效应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_cons	2.6648***	2.4287***	2.4286***	2.4188***	2.5804***
	(0.2131)	(0.2495)	(0.2500)	(0.3353)	(0.3921)
N	5858	5858	5858	2627	3231
R <sup>2</sup>	0.0622	0.0967	0.0967	0.1208	0.0911

注：括号内为标准差，\*  $p < 0.1$ ，\*\*  $p < 0.05$ ，\*\*\*  $p < 0.01$

第一列是基准模型，未控制年份、行业和地域的固定效应，可以看出，腐败有助于公司

获得政府补助。第二列在控制了年份、行业和地域固定效应之后，腐败对于公司所获政府补助的正向影响程度减弱，但是仍在 1%水平上显著，并且，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上，产权性质的回归系数变得显著，这一结果表明，国有企业背景有助于公司获得政府补助。这一结果证实了假设 1，即腐败促进政府补助的获得，且国有企业比民营企业获得更多的政府补助。第三列加入了产权与腐败的交互项，可以看出，加入交互项之后腐败仍有助于公司政府补助的获得，但是产权性质对于公司获得政府补助的影响变得不再显著，交互项也不显著。第 4 列和第 5 列分别在不同的产权性质背景下，分样本回归来检验腐败对于政府补助的影响，回归系数表明，对于国有企业，腐败对于政府补助的获得并没有帮助，但是对于民营企业而言，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腐败提高了公司所获得的政府补助。证明了假设 2，即民营企业比国有企业更依赖于腐败去获得政府补助。

#### （四）腐败、产权性质与政府补助的创新补贴动机

我们用模型 2 来检验假设 3，所得的回归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 3 创新补贴动机下的腐败、产权与政府补助的关系

	(1)	(2)	(3)	(4)国有	(5)民营	(6)	(7)
RandD	0.0331*** (0.0037)	0.0262*** (0.0041)	0.0215*** (0.0043)	0.0373*** (0.0098)	0.0248*** (0.0046)	0.0258*** (0.0041)	0.0171*** (0.0055)
bribe						0.0490 (0.0440)	-0.0156 (0.0565)
bribe*RandD							0.0192* (0.0103)
soe	0.0473** (0.0193)	0.0567*** (0.0204)	0.0243 (0.0235)			0.0558*** (0.0204)	0.0548*** (0.0204)
soe*RandD			0.0192** (0.0093)				
asset	-0.1035*** (0.0098)	-0.1005*** (0.0108)	-0.1003*** (0.0108)	-0.0949*** (0.0133)	-0.1147*** (0.0176)	-0.0961*** (0.0115)	-0.0985*** (0.0116)
debt	0.0003 (0.0005)	0.0012** (0.0006)	0.0012** (0.0006)	-0.0005 (0.0009)	0.0024*** (0.0008)	0.0011* (0.0006)	0.0010* (0.0006)
roe	-0.0029*** (0.0008)	-0.0020** (0.0009)	-0.0021** (0.0009)	-0.0049*** (0.0012)	0.0012 (0.0013)	-0.0021** (0.0009)	-0.0020** (0.0009)
年份固定效应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域固定效应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_cons	2.6497***	2.4772***	2.4873***	2.4219***	2.7082***	2.3730***	2.4512***



N	5791	5791	5791	5791	5791	5791	5791	5791	5791
---	------	------	------	------	------	------	------	------	------

注：括号内为标准差，\*  $p < 0.1$ ，\*\*  $p < 0.05$ ，\*\*\*  $p < 0.01$

表 4 中所示是在不同分位数水平下的回归结果，通过分位数回归更细致地刻画腐败对于政府补助的创新补贴动机的影响。结果表明，研发能力对于公司获得政府补助的帮助作用，是受到腐败水平影响的，但这种影响随着研发支出的不同水平而变化。具体来说，公司研发支出对于政府补助的获得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分位数回归的结果表明，获得政府补助金额越高的企业，研发支出的促进作用越大。在控制了企业研发能力的条件下，腐败对于公司获得政府补助金额的影响，呈现非线性的关系。对于所获政府补助较多的企业（政府补助率在 70% 分位数水平以上），腐败对于政府补助的影响并不显著，研发能力占据了主导作用。但对于所获政府补助较低和适中的企业（政府补助率在 60% 分位数水平以下），腐败对于政府补助的获得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由腐败与公司研发支出的交互项系数可以看出，在获得政府补助较少和适中的条件下，公司依靠研发能力所获得的政府补助金额会受到腐败水平的影响，腐败的水平越高，公司凭借研发能力所获得的政府补助越多。但在获得政府补助较多的企业中，腐败水平对于公司依靠研发能力所获得的政府补助并没有显著的影响。这一结果表明，在创新补贴动机下，获得较多政府补助的公司更多地凭借其过硬的技术水平。此外，在控制了研发能力和腐败水平的条件下，产权性质对于公司的政府补助获得的影响均不显著。

### （五）腐败、产权与政府补助的盈余管理动机

我们用模型 3 来检验假设 4，先考虑产权对于政府补助的影响，所得的回归结果如表 5 所示。

表 5 盈余管理动机下的产权与政府补助

	(1)	(2)	(3)	(4)国有	(5)民营
EM	0.1229*** (0.0253)	0.1121*** (0.0249)	0.0712** (0.0340)	0.1283*** (0.0368)	0.1054*** (0.0336)
soe	0.0245 (0.0195)	0.0417** (0.0205)	0.0231 (0.0209)		
EM*soe			0.0816* (0.0487)		
asset	-0.1113*** (0.0097)	-0.1040*** (0.0109)	-0.1040*** (0.0109)	-0.0987*** (0.0134)	-0.1178*** (0.0177)
debt	-0.0013** (0.0005)	0.0001 (0.0006)	0.0002 (0.0006)	-0.0016* (0.0009)	0.0013 (0.0008)
roe	-0.0024*** (0.0009)	-0.0017* (0.0009)	-0.0017* (0.0009)	-0.0047*** (0.0013)	0.0019 (0.0013)
年份固定效应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域固定效应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_cons	2.9376***	2.5967***	2.5997***	2.5344***	2.7945***

	(0.1993)	(0.2355)	(0.2354)	(0.3070)	(0.3658)
<i>N</i>	5858	5858	5858	2627	3231
<i>R</i> <sup>2</sup>	0.0621	0.0981	0.0987	0.1242	0.0915

注：括号内为标准差，\*  $p < 0.1$ ，\*\*  $p < 0.05$ ，\*\*\*  $p < 0.01$

第一列为基准模型，未控制年份、行业和地域的固定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具有盈余管理需求的公司，会显著地获得更多的政府补助，证实了政府补助的盈余管理动机。第二列对年份、行业和地域的固定效应进行了控制，政府补助的盈余管理动机仍很显著，在控制了政府补助的盈余管理动机的条件下，国有企业比民营企业获得更多的政府补助。第三列加入了产权和盈余管理需求的交互项，产权性质对于公司政府补助的获得影响不再显著，但是交互项系数在 10%水平下显著，表明在同样存在盈余管理需求的情况下，国有企业比民营企业获得更多的政府补助。列4和列5区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分样本回归也证实了这一结论，国有企业相比较于民营企业而言，盈余管理需求对于公司获得政府补助的影响程度更大。

接下来在模型中引入腐败变量，所得的回归结果如表 6 所示。

表 6 盈余管理动机下的腐败、产权与政府补助

	(1)	(2)	(3)EM=1	(4)EM=0
EM	0.1112*** (0.0249)	0.1161*** (0.0416)		
bribe	0.1377*** (0.0508)	0.1429*** (0.0506)	0.0682 (0.1169)	0.1620*** (0.0503)
EM*bribe		-0.0159 (0.1158)		
soe	0.0394* (0.0205)	0.0394* (0.0205)	0.1195** (0.0537)	0.0227 (0.0211)
asset	-0.0913*** (0.0113)	-0.0913*** (0.0114)	-0.1349*** (0.0293)	-0.0779*** (0.0118)
debt	-0.0001 (0.0006)	-0.0001 (0.0006)	0.0011 (0.0015)	-0.0008 (0.0006)
roe	-0.0018* (0.0009)	-0.0018* (0.0009)	-0.0020 (0.0019)	-0.0010 (0.0010)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域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_cons	2.2931*** (0.2471)	2.2920*** (0.2468)	3.3226*** (0.6505)	2.0003*** (0.2553)
<i>N</i>	5858	5858	1309	4549
<i>R</i> <sup>2</sup>	0.1007	0.1007	0.1181	0.1023

注：括号内为标准差，\*  $p < 0.1$ ，\*\*  $p < 0.05$ ，\*\*\*  $p < 0.01$

表 6 考察在政府补助的盈余管理动机下，腐败对于政府补助的影响。第一列的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公司的盈余管理需求的条件下，腐败仍然会显著地提高公司所获得的政府补助金额。第二列加入了盈余管理需求与腐败的交互项，但是交互项的系数并不显著，而盈余管理

需求和腐败对于政府补助的单独影响仍显著。列三和列四是对公司的盈余管理需求情况进行的分样本回归,通过区分有无盈余管理需求的公司样本,来研究腐败对于公司所获得的政府补助金额的影响。列三的结果表明,在有盈余管理需求的样本中,腐败对于公司政府补助的获得帮助不大,而产权性质对于公司政府补助的获得有着显著的影响,在此条件下,国有企业比民营企业获得更多的政府补助。列四的结果与列三的结果恰好相反,在无盈余管理需求的样本中,腐败对于公司获得政府补助的帮助作用是显著的,而产权性质对于公司获得政府补助并无显著影响,在此条件下,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获得政府补助方面并无显著性的差异。回归结果证实了假设 4,即政府补助具有盈余管理动机,腐败对于盈余管理动机下的政府补助获得无显著影响。

## **(六) 稳健性检验**

### **1. 内生性问题的解决**

为了减弱内生性问题对于回归结果的影响,本文对于公司的研发支出和公司的“招待差旅费用”变量采用了滞后一期的数据替代原有数据,以消除数据中可能存在的同期相关和双向因果关系的影响。对主要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检验表明,本文的主要结论仍然成立,结果保持稳健。

### **2. 政府补助的社会就业动机检验**

学者研究指出,政府补助还可能具有实现社会就业目标的动机,承担了更多社会责任的企业,会得到更多的政府补助,以弥补其付出的成本(唐清泉等, 2007)。本文以员工人数的自然对数来衡量企业所承担的社会就业目标,实证结果不支持政府补助的就业目标动机,企业的就业规模对政府补助的获得无显著影响。

## **五、 结论**

本文研究腐败与产权性质对于公司政府补助获得的影响。我们以我国 A 股上市公司 2007-2013 年的数据为样本,以公司所披露的财务数据“招待差旅费用”作为腐败的代理变量,检验结果发现,国有企业要比民营企业获得更多的政府补助,腐败对于公司获得政府补助具有显著的帮助作用,这一结果表明,企业向政府寻租的行为会影响到政府的资源配置决策。

进一步地,本文研究了政府补助的创新补贴和盈余管理两大动机,分别探究在这两种动机下,腐败对于公司获得政府补助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政府补贴存在着创新补贴动机,在创新补贴动机下,国有企业比民营企业获得更多的政府补助,而腐败对于公司获得政府补助的影响并不显著。用分位数回归的方法更细致地探究创新补贴动机下腐败与政府补助的关系时,我们发现,获得政府补助水平较高的公司中,腐败对于公司的政府补助获得无显著影响,但是在政府补助水平适中和较低的公司中,腐败对于公司政府补助的获得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同样地,我们的实证结果证实,政府补贴存在着盈余管理动机,在盈余管理动机下,国有企业仍比民营企业获得更多的政府补助,控制了公司的盈余管理需求的条件下,腐败对于公司政府补助的获得仍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更进一步地,在存在盈余管理需求的样本组,腐败对于公司政府补助的获得无显著影响,与之相对照的,在不存在盈余管理需求的样本组,



腐败会显著提高公司获得的政府补助。

本文具有鲜明的政策含义：为解决政府补助向寻租企业倾斜的问题，政府部门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补贴标准更加明晰，减少权力寻租的空间。企业的寻租行为能够对政府补助的分配产生影响，根本原因在于这一领域存在权力寻租的空间，由于有些补贴项目补贴标准的不明晰，变相增加了分配者的权力。因此，应推动补贴标准的规范化，约束行政权力的过度干预；第二，进一步加大反腐败力度。近来，我国的反腐败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得到了民众的肯定与拥护。腐败所反映的寻租行为只是腐败问题的一个方面，背后与之相联系的可能是掩盖在表象下的更深层次的腐败，腐败影响资源配置的行为损害了社会的公平正义。因此，对于反腐败工作，我们应该长抓不懈；最后，信息披露更加公开透明。“让权力运行在阳光之下”，发挥社会和舆论的监督机制，是减少腐败的有效举措。同上市公司一样，政府部门规范而充分的信息披露，会使得民众对于政府更加理解和信任，有利于政府工作的开展。

### 参考文献

- [1]步丹璐,郁智. 政府补助给了谁:分布特征实证分析——基于 2007~2010 年中国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 财政研究, 2012 年第 08 期.
- [2]顾元媛,寻租行为与 R&D 补贴效率损失,经济科学, 2011 年第 05 期.
- [3]郭剑花,杜兴强.政治联系、预算软约束与政府补助的配置效率——基于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研究,金融研究, 2011 年第 02 期.
- [4]黄玖立,李坤望.吃喝、腐败与企业订单,经济研究, 2013 年第 06 期.
- [5]孔东民,刘莎莎,王亚男,市场竞争、产权与政府补贴,经济研究, 2013 年第 02 期.
- [6]李汇东,唐跃军,左晶晶,用自己的钱还是用别人的钱创新?——基于中国上市公司融资结构与公司创新的研究,金融研究, 2013 年第 02 期.
- [7]刘锦,王学军,寻租,腐败与企业研发投入——来自 30 省 12367 家企业的证据,科学学研究, 2014 年第 10 期.
- [8]陆国庆,王舟,张春宇,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政府创新补贴的绩效研究,经济研究, 2014 年第 07 期.
- [9]潘越,戴亦一,李财喜,政治关联与财务困境公司的政府补助——来自中国 St 公司的经验证据,南开管理评论, 2009 年第 05 期.
- [10]唐清泉,罗党论,政府补贴动机及其效果的实证研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金融研究, 2007 年第 06 期.
- [11]王凤翔,陈柳钦,中国地方政府对本地竞争性企业财政补贴行为研究,南开大学工作论文, 2005,.
- [12]王红建,李青原,邢斐,金融危机、政府补贴与盈余操纵——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管理世界, 2014 年第 07 期.
- [13]魏尚进,经济中的贿赂:是润滑剂还是沙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11 年第 01 期.
- [14]魏下海,董志强,金钊,腐败与企业生命力:寻租和抽租影响开工率的经验研究,世界经济, 2015 年第 1 期.
- [15]解维敏,唐清泉,陆姗姗,政府 R&D 资助,企业 R&D 支出与自主创新——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金融研究, 2009 年第 06 期.
- [16]许罡,朱卫东,张子余,财政分权、企业寻租与地方政府补助——来自中国资本市场的经验证据,财经研究, 2012 年第 12 期.
- [17]余明桂,回雅甫,潘红波,政治联系、寻租与地方政府财政补贴有效性,经济研究, 2010 年第 03 期.
- [18]Arrow, K., 1962, "Economic Welfare and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for Invention", The rate and direction of inventive activity: Economic and social factor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9]Barone, G. and Narciso, G., 2015, "Organized Crime and Business Subsidies: Where Does the Money Go?",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Vol.86: 98-110.
- [20]Buigues, P. and Sekkat, K., 2011, "Public Subsidies to Business: 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Journal of Industry, Competition and Trade*, Vol.11(1): 1-24.
- [21]Cai, H., Fang, H. and Xu, L. C., 2011, "Eat, Drink, Firms, Government: An Investigation of Corruption From the Entertainment and Travel Costs of Chinese Firms",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54(1): 55-78.
- [22]Chen, C., Li, Z. and Su, X., 2005, "Rent Seeking Incentives, Political Connections and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Listed Family Firms in China",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Working Paper*.
- [23]Chen, X., Lee, C. J. and Li, J., 2008, "Government Assisted Earnings Management in China",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Public Policy*, Vol.27(3): 262-274.
- [24]Faccio, M., 2006, "Politically Connected Firm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96: 369-386.
- [25]Frye, T. and Shleifer, A., 1997, "The Invisible Hand and the Grabbing Hand",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87(2): 354.
- [26]Jianfeng, W. and Menita, L. C., 2011, "The Impact of Managerial Political Connections and Quality On Government Subsidies", *Chinese Management Studies*, Vol.5(2): 207-226.
- [27]Li, J. and Zhao, L., 2015, "The Costs of Socializing with Government Officials: A New Measure of Corporate Political Connections", *China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Vol.8(1): 25-39.
- [28]Murphy, K. M., Shleifer, A. and Vishny, R. W., 1993, "Why is Rent-Seeking so Costly to Growth?",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83(2): 409-414.
- [29]Romano, R. E., 1989, "Aspects of R&D Subsidization",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104(4): 863-873.
- [30]Schwartz, G. and Clements, B., 1999, "Government Subsidies", *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s*, Vol.13(2): 119-148.
- [31]Shleifer, A. and Vishny, R. W., 1994, "Politicians and Firm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109(4): 995-1025.
- [32]Tassey, G., 2004, "Underinvestment in Public Good Technologies", *The Journal of Technology Transfer*, Vol.30(1-2): 89-113.
- [33]Usher, D., 1964, "The Welfare Economics of Invention", *Economica*, Vol.31(123): 279-287.
- [34]Zhu, J. and Wu, Y., 2014, "Who Pays More “Tributes” to the Government? Sectoral Corruption of China’S Private Enterprises", *Crime, Law and Social Change*, Vol.61(3): 309-333.